

经济要素与国际权势地位关联机制的再考察

任欣怡

西北政法大学,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互动中, 权势地位不仅与国家利益高度关联, 更是国际互动的根本动力和国际关系的一般机理。尽管不同学派流派各有侧重, 但对于权势地位中的物质实力资源都一致地予以价值或功能上的肯定。在当前的强国竞争情势下, 物质实力基础中的经济要素逐渐成为战略投资的优先选项乃至强国竞争的优胜选择。在由此而来的强国经济实力的学理判定中, 对经济总量的考察成为了一种流行看法。但相比起结合经济发展成本的实力分析和国际分工结构的位置判定等更为深刻全面的考察路径, 以经济总量考察国家经济实力则可能具有忽视经济要素不可转换性、经济总量计算偏差和与国际政治历史实践相悖等现实盲区。

【关键词】 强国竞争; 权势地位; 国际分工; 信息技术; 国际金融

Review of the Co-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F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Power Status

Ren Xinyi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 In a state of international anarchy, power status is not only highly relevant to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lso is the fundamental dynamic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 general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hough different academic schools have their own emphasis, however, the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power status are consistently testified in terms of value and function. In the curren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ituation, the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foundation of material power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preferred option of strategic investment and even the superior choice of winning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capability is handled with a pervasive modus operandi which mainly focuses the scale and total sum. However, compared with more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methods such as power analysis combin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cost an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method of examining economic capability by economic aggregate may neglect the non-convertibility of economic factors, multi-calculation of the economic aggregate, and paradoxes with historical cases.

[Keyword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power statu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finance

据说, 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 国际关系互动的核心机理在于强权国家之间展开的权势角逐(great power competition), 这种角逐往往自然或者有意地导出一种被称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过程和结果, 由此, 权势的均衡往往与体系的稳定、秩序的运转直接关联。根据流行学派的说法, 特别对于体系内强国而言, 权势地位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重合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地, 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大概仅在语义学(semantics)的范畴中才存有意义。既然权势地位作为国际互动的根本动力(dynamic)和国际关系的一般机理(mechanism)得以广泛确认, 那么, 关于权势地位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什么是当前国际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权势要素, 权势地位竞争会导致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吗, 这些问题的探讨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关系基础研究的核心关照与根本命题。

1 国际权势地位及其构成要素的学理分析

权势地位作为一种相对性支配关系的效果, 是由其物质基础决定的。这种物质基础可以被还原为更为根本的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随着二战以来国际进程的发展变化, 经济要素越来越在支撑国际权势地位中具有优先地位。

1.1 国际权势地位的学理争鸣

对于权势地位的主张是各国际关系流行学派的一致看法,

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何界定权势地位的内涵与要素。现实主义者(Realist)和自由主义者(Liberalist)大概从物质决定论(materialism)的意义上研究权势地位的相关经验, 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则是从观念优先(idealism)的维度重新塑造了对权势地位的理解。^[1]

将权势地位还原为军事和经济这两大要素并不是现实主义者的独创或者专属——虽然这是他们的鲜明立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认为, 在国际政治中, 一国有效的权势最终源于其军事能力。^[2]现实主义者之所以不会反对这样的判断, 乃是基于一种历史观察, 即, 在原子弹所带来的恐怖平衡以前, 就抑制国际威胁和支配国际事务而言, 国际战争发挥了类似国内选举似的功能——只不过更为致命和原始罢了。^[3]对此, 泰勒(A. J. P. Taylor)有更为精炼的表述: 强权与否, 大战判定。^[4]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也持相同的看法,^[5]但是他也特别强调, 没有国民经济的支撑, 现代战争也将难以为继。^[6]除此以外, 也有现实主义者根据国际分工(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labor)的发展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进程, 将权势地位的关键支柱判定为经济因素。比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将一国在世界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国际分工)的位置作为决定其国际权势地位的头号因素(principal

determinant)。[7]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虽然声称自己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但他也能大方承认,大战的胜利者往往属于握有最后一个铜板的一方。[8]

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物质主义大概主要以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为核心要义。这里的国际制度不仅能够保障合作及其长远预期,而且也被看做是“软权力”(soft power)的表现形式。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发现,在国际关系中,共同利益并不自动导致合作,而国际机制作为一种达至合作的必要条件,乃是由于其不但能够减少不确定性,而且还能改善信息不对称。[9]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学理概念是软权力。根据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创造,软权力是一种权势要素使用方式——强制(coercion)、收买(payment)和劝说(persuasion)中的最后一种——而不是权势要素本身,也就是说,那种将文化等于软权力的认知至少是个误会。而如果说软权力就是通过合作而影响其他行为体,那么它就意味着框定议程(framing the agenda),劝说(persuading),以及施展魅力(eliciting positive attraction),以此达到想要的结果。[10]由此可见,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和运作而发挥国际权势就是软权力效果的典型体现。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对上述的物质主义路径进行了彻底反思,他认为用观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特别是文化的方式,对国际政治进行学理建构才是正途——在此,物质力量被置于观念力量的支配之下。[11]也就是说,温特将对国际权势的理解拉回到“武器不杀人,人杀人”的终极拷问中,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机理不在于物质因素的搅动,而在于观念认知的锁定。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充满了人文关怀和进步温情,但是,就实践性而言,在上述三大流行学派中,建构主义的影响力明显弱于前两者,特别是逊于现实主义。本文并不试图就物质主义还是观念主义之间的论争进行裁判,而是主张,即便在建构主义的逻辑下,作为权力或者利益的关联事物,哪怕是在观念和进程的约束和使用之下,物质实力资源也是有其关键作用和紧要价值的。也就是说,对主要由经济和军事构成的一国物质实力资源的考察并不与结构性的文化特质相悖;除此以外,往往正是由于决策者对于国际进程的悲观预期导致了对于物质性力量的重视和利用。[12]这里还需要加以引证的一点是,在一百多年前著作中,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就从物质层面将历史定义为人类不断增加其对能源(energy)控制的历程,[13]即便作者在书中也同时指出,理念(idea)同样是创造历史的一支力量。[14]在这一点上,更为决绝的当数斯拜克曼,他认为出于政治意图而推进文化合理与合作的,根本就是痴心妄想。[15]

1.2 国际权势地位的经济基础

如前所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是权势地位的物质主义推崇者。当然,这种物质主义并不是忽略观念的作用,而是将物质要素作为关联国家利益的优先选项。如果说在权势地位的物质要素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军事和经济,那么,同样需要予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当前的强国竞争情势中,何者才是更为优先的战略投资选择?

约瑟夫·奈在论述软权力的概念时,特别指出:时至今日,权力的定义正在失去先前时代那种对于武力和征服的强调;而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这些要素,对于国际权势地位而言,则变得越发重要。[16]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中一个首要特征(principal features)就是武力效用的衰落与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加,至少在强国之间(among the major developed states)确实如此。[17]这里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和经济要素相比,军事或者武力的效用在国际事务中的极端重要性减弱,首先是因为核武器带来的战略僵持,也就是确保互相摧毁(MAD)的静态格局在国际安全领域成为持续存在的常量(constant)。所以,武力效用降低并不意味着武力不再发挥效用,而是说武力不能成为强国竞争的决胜领域,至少不能成为先发制人的领域。

与此同时,经济实力,或者说经济要素,要么可以被看成是促成军事实力更为基础的因素,要么可以被看做是在前述安全结构僵持的状况下,实现强国竞争优胜的惟一选择。就前者而言,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一国的军事能力有多强,则其对先进技术的要求就有多高,也就是说,一国的军事成就的高低反映了其经济水平的高低;[18]就后者而言,邝云峰就认为,作为军事能力基础的经济实力,才是强国竞争的关键变量(critical variable to watch),不能在经济上有所建树的强国,自然无法撼动现有国际霸权秩序(the Pax Americana)。[19]当然了,更为根本的是,对于吉尔平来说,不平衡发展是导致体系变革的经久动力,[20]这种不平衡发展自然是以技术为牵引的生产力决定的。如此一来,对于包括技术和金融在内的广义上的经济要素的考察,自然而然成为当前国际情势中的优先选择和必经之路。

2 国际权势地位中的经济总量设定及其现实盲区

如前所述,无论是从学理思辨还是从量化还原来看,将物质性的权势基础归结为对经济实力要素的考察可以是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分析路径。那么,由此而来的议题延展,则必须就一种流行的看法做出评介——即经济总量决定论,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际份额占比决定论。

2.1 经济总量作为核心变量的学理主张

保罗·麦克唐纳德(Paul K. MacDonald)在其与约瑟夫·培伦特(Joseph M. Parent)合著的《巨人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and Retrenchment)一书中,对于国际政治权势转移(power transition)及其可能引发的强国政治的竞争这一主题进行了细致分析。作者们发现,大国权势地位衰落(power decline)与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选择之间的因果关联机制不光直接而且经久。本文对此议题研究需要加以引证的,是作者们就战略收缩的前提——权势地位衰落——所进行的界定。该书在其开篇便指出:作为学理构建的前提,一种基于对物质要素的强调成为优先的假定,因为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这种物质主义对于我们分析国家权势地位而言,不仅根本而且可测;虽然其他一些要素也同样不可忽视,但毋庸置疑的是,物质资源是前提(foundation)。[21]根据这一假定,一种基于经济总量的考察便紧随其后——他们通过比较国家间的GDP全球份额来测量相对

权势地位的起伏；非但如此，按照从2%—4%的衰减幅度，一国的衰落被识别轻度、中度或者重度。^[22]作者们对这一研究方法进行辩护时声称，之所以将经济要素置于最为前置的位次，乃是由于经济要素的可转换性——也就是说，经济能力可以转换为诸如政治、军事和文化之类的各式权力要素；除此以外，如果说权力和财富具有替代性和叠加性的效果，那么经济能力就以其储备指标（stock measure）的特性，更是可以被作为最佳测量标准！^[23]

除此以外，由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领衔的哈佛大学研究团队也就新时期强国经济竞争的议题进行了最新的考察，他们的分析报告也认为：一个国家的GDP是其全球权势地位的基础，虽然GDP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或军事实力，但如果以历史为鉴，GDP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塑造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也相应更大；如果用传统的GDP衡量标准——市场汇率来衡量，发展势头不减的新兴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从占美国GDP份额的10%上升至2021年的78%。^[24]甚至，大量证据显示，新兴强国正在迅速超越美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了40倍。^[25]

上述研究都将国际权势地位与经济总量，主要是GDP的相对份额，作为衡量国际进程的核心变量。这种做法不但直观而且简便，在国际体系范围内，无论对于患有焦虑冲动的主导国，还是对于抱有乐观期待的崛起国，他们都可以从这一简单的推理中获得各自想要的结果，证明各自主张的趋势。然而，本文认为，透过这样的关联机制来观察国际政治的运行，也就一定存在着很难避免的侵蚀国际政治真相的现实盲区。

2.2 经济总量考察的现实盲区

由一国经济总量来分析国际权势地位的现实盲区大概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经济要素的可转换性；其二，经济总量的计算方法；其三，国际实践的悖论。

在经济学世界里，货币作为资本的一种表现和贮藏方式，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地位，因此，企业家们的努力就是让各自生产的商品变现为货币。然而，在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的世界里，经济，或者说财富或货币，则未必也具有同样的功效。郑必坚教授早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阐明，与经济增长相伴而行的一面是，光凭这一指标是无法就一国的发展做出整体性判断的。^[26]大卫·鲍德温（David A. Baldwin）则指出了这种经济能力转换性的两个症结：可转换性（Fungibility）意味着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问题领域（issue-area）相对轻易地进行切换；然而，问题也就恰恰存在于此。^[27]试想一下，如果经济要素是权力要素可以转换的一般等价物，那么，包括国际反恐、气候治理、卫生防疫在内的全球治理挑战，是因为资金投入不足才导致的进展不佳吗？除了问题领域，另一个关于转换性的症结在于，即便这种转换是可行的，但是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者说时间成本较高——只有从长远的（in the long run）角度说，这种转换是可靠的。^[28]

计算一国经济总量的方法较为流行的有两种：市场汇率计算和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后者也叫“巨无霸指数”）。根据市场汇率来看，排除欧盟这个超国家共同体，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获得了世界第二的位次。^[29]然而，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法，则中国

的经济总量不光早已超过了美国，而且已经占到了全球GDP份额的18%。^[30]由此看来，不同的计算方法导出的国际政治进程可以大为不同。

在《巨人的黄昏》一书中，作者们根据他们用经济总量的预设方法判断出的一个现象是：中美两国并没有经历过衰落。^[31]其实，相比于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这两位作者的判断颇为保守。根据的麦迪森的研究，中国2003年在世界GDP所占份额的比重甚至与1820年相比差了不少一倍！（15.1:32.9）。^[31]除此以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冷战期间，在与苏联展开强国竞争的较量中，美国为了扶植日本而选择了自我贸易歧视——也就是单方面对日本开放市场而不寻求对等待遇。^[32]这种策略选择自然会对日本的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产生巨大的利好效应，因此，日本经济总量的飙升乃至一度超过美国。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并不能得出在GDP份额的起伏中，一国的权势地位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那么，如果经济是衡量一国权势地位的核心要素这个假设依然成立，则如何在分析国际关系时修正对于经济总量的流行偏好呢？

3 国际权势地位中经济实力要素的再审视

本文认为，物质主义的还原方法对于国际权势地位的研究而言，具有明显优势。经济实力作为物质要素中更为基本的项目，对于强国而言，自然少不了以其总量或者规模作为必要条件。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规模的提纯分析，以及关于分工的结构分析，是我们避免前述现实盲区的有效救济。

3.1 经济总量的提纯分析

新兴强国的崛起与既有霸主的衰落，可以被认为是新世纪国际关系实践的最大特征，这样的权势转移仅从各自经济发展的量化考核及其发展趋势预判就能够大致可知。然而，这种流行的总量判定法却受到了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的挑战。

贝克利认为：人们考察两强竞争时，忽视了对成本的关照；而当这一关照被补足之后，那么，相较于新兴的崛起国，既有的体系主导国的优势则更为明显。这一论断的学理依据在于，作者认为一国的权势地位并非源于其总资源（gross resources），而是决定于净资源（net resources）——也就是去除成本之后的剩余的资源部分。至于此处所提及的成本，则包括了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s）、福利成本（welfare costs）和安全成本（security costs），它们对对一国的权势地位能够产生侵害影响。^[33]其实，在这之前，郑必坚教授也做出了大致相同的主张，他认为新兴崛起国在2050年达到现代化的中等发达国家之前，还面临着三大问题：资源短缺、环境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34]而资源与环境问题则是短期内经济飞速增长所付出的成本。

根据自己的学理推论，贝克利创造了对净资源的提纯方法：即用一国的GDP乘以人均GDP（GDP × GDP Per capita）。简单套用这一公式便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那就是当前的新兴崛起国虽然比其在十九世纪的国际权势地位已经有了根本优化，但与其当前经济总量所表示的位次还存在明显错置的可能；至于新兴崛起国与既有主导国实力发展曲线的交叉则远未出现。^[35]贝利克的分析为利用经济总量或者说资源总量来分析国际权势地位提供了深刻的教益：其一，它将强国竞争与治理

能力相关联。强国竞争并不是独立的领域或者孤立的事项,为了提升国际权势地位,理性的选择当然是降低资源成本,因此就要提升治理能力和深化改革进程。其二,它将国际战略与国内需求相平衡。政策选择需要付出机会成本的代价——也就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无论是推进国际战略还是满足国内需求,都需要资源的投入。但是,资源又总是稀缺的,因此,在强国竞争的博弈过程中,把握资源投入的平衡应该成为一项更为优先的指导原则,创造一个有利于开放、创新和包容的国内社会,也许是更为紧要的选择。这也就是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在其就如何避免新的冷战一文中所提出的劝告。^[36]

如果说对经济总量的考察需要透视一国内部治理的状况,特别是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关键变量甚至已经在强国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在此基础上对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的结构分析,也就成为了避免由简单的总量决定论造成现实盲区的又一个救济选择。

3.2 国际分工的结构分析

降低资源成本的办法,根据上文所述,需要依靠创新技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科技(Science & Technology)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国际关系进程最为强大和持久的因素(most powerful and persistent factors)。^[37]可以说,技术的发展水平,对于强国竞争而言,决定了一国的相对比较优势,也自然配置了该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位置。社会活力越充分,科技创新越积极,则国家经济实力越稳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也就相对越有利,由此获得的非对称权势也越明显。在这里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其一,经济总量或者规模并非不重要,而是说在强国竞争中,在全球价值链(GVC)、生产网(GPN)这些结构性因素影响下,单靠规模效应所导出的权势效果并不直接也不高效;其二,占有核心科技对于参与战略竞争的强国而言,是一种有之必不然,无之必不然的状况。

兰德公司(Rand)在2000年关于国际权势地位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后工业时代国家权力的衡量领域大致分为三个:第一个领域包括一个国家可获得的或由该国生产的资源水平;第二个领域包括国家绩效,它既来自于一个国家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来自于其名义上被称为“国家”的治理机构及其整个社会的效率;最后,第三个领域包括军事能力,这被理解为行动的熟练程度或有效性。^[38]

该研究还认为,国家权力最终是两个部分相互作用的产物: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间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然后利用这种主导的成果产生有效的军事能力。这些能力反过来加强现有的经济优势,同时产生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虽然主要是为了本国的战略优势而维持,但也为整个国际体系带来了好处;因此,从权力政治的意义上说,能够主导全球经济的主要部门的最终价值在于,它使获得和维持霸权成为可能。例如,已有证据表明,在创新周期中获得早期领先地位对于产生霸权至关重要,因为最初的经济主导地位通常可以让创新国家抵御后来的挑战者。^[39]

简而言之,创新能力越强的国家,越能在经济领域获得权力优势。因此,在衡量经济实力时,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考察

是必不可少的。科技创新能力与资源转化能力息息相关,创新能力越强,资源转化能力与资源利用率就越高,同等份额资源产出的经济增长就越高。然而,产业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于核心技术领域的依赖也各不相同。自从进入信息时代——或者也可以叫做知识经济——以来,信息就成为当今最为核心的尖端科技,甚至还被视为权势地位本身。^[40]

当然,科技作为一个变量被认为是影响大国兴衰的关键要素,但是,除此以外,是否具有国际货币主导权也是和科技实力同样重要的另一根强国竞争支柱。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其《国家与市场》一书中就指出,所谓结构性权势地位(structural power)是由包括安全(security)、金融(finance)、生产(production)和知识(knowledge)四个维度组合而成的。^[41]至少,二战以来的国际权势分配就是建立在这四个基础之上的,甚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没有太大变化的迹象。最后,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分析,国际权势的主导地位是指同时占有农业-工业优势(Agro-industrial edge)、商业优势(Commercial edge)和金融优势(Financial edge),但是,随着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时代的来临和国际分工的优化,同时占有三个经济部门优势的条件已经不能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权势地位不复存在,要么是依靠金融为主的优势继续占据核心分工位置并进而获得相对权势地位。根据国际进程的实际观察和体验,后一种的发展趋势可能更为明显。

4 结语

科技的发展使得战争,特别是大战(total war),作为一种强国竞争的可能选项几乎已经被完全排除,但是,强国竞争本身却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如果说核武器带来的是一种负向的相互依存,那么,全球化(globalization)则促进了一种相对正向的相互依存。在这两大事态的加持之下,如何依靠包括科技和金融在内的经济竞争塑造强国博弈的新范式,即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也是担当负责任大国的必然选择。本文认为,决定这一竞争过程和结果的,并不是简单的总量或者规模优势,而是维护创新经济、提升治理能力,同时在此基础上优化比较优势、升级结构位置。

参考文献

- [1]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3.
- [2]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55.
- [3] William Thompson, *Systemic Leadership,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Unipolar Ques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8, 2006, pp.1-22.
- [4]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xxiv.
- [5]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 Y.: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22.
- [6] Ibid, p34.

- [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32.
- [8]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Y.: Random House, 1987, pxxiv.
- [9]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2.
- [10]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Y.: Public Affairs, 2011, p16.
- [11]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71.
- [12] Daniel W. Drezner, *The Perils of Pessimism: Why Anxious Nations Are Dangerous N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101, No. 4, 2022.
- [13] James Fairgrieve,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24, p3.
- [14] *Ibid*, p94.
- [15]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Y.: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257.
- [16]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1990.
- [17] Robert W. Tucker, David C. Hendrickson, *The Imperial Temptation: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American's Purpose*,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2, p6.
- [18]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6.
- [19] Khong Yuenfoong, *The U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nalogy*,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February 15, 2020.
- [20]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3.
- [21] Paul K. MacDonal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and Retrenchment*,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6.
- [22] *Ibid*, p45.
- [23] *Ibid*, pp. 45-46.
- [24] Graham Allison, Nathalie Kiersznowski, Charlotte Fitzek, *The Great Economic Rivalry: China vs the U.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arch, 2022.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great-economic-rivalry-china-vs-us> (2022/08/03)
- [25] Michael Beckley and Hal Brands, *The End of China's Rise: Beijing is running out of time to remake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 2021.
- [26]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2005.
- [27] David A. Baldwi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pproach*,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0.
- [28] *Ibid*, p72.
- [29]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6.
- [30] *Ibid*, p10.
- [31] Paul K. MacDonal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and Retrenchment*,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6.
- [32] Angus Ma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Second Edition)*,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 p44.
- [33] Joel Kotkin, Yoriko Kishimoto, *The Third Century: America's Resurgence in the Asian Era*, N.Y.: Crown Publishers, INC., 1988, p58.
- [34] Michael Beckley, *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2 (Fall 2018).
- [35]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2005.
- [36] Michael Beckley, *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2 (Fall 2018).
- [37] Melvyn P. Leffler, *Avoiding Another Cold Wa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January, 2020.
- [38] Eugene B. Skolnikoff, *The Elusive Trans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
- [39] Asb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etc.,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California: Rand, 2000, pxii.
- [40] *Ibid*.
- [41] Matthew J. Slaughter, David H. McCormick, *Data Is Power: Washington Needs to Craft New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No. 3, 2021.
- [42]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Second Edition)*, N.Y.: Continuum, 1994, pp. 24-25.